

# 打造民主傳播生態系統： 地殼大變動下的台灣媒體地景與前景

**胡元輝**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



## 胡元輝

### 現任：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

### 學歷：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 經歷：

公視總經理、台視總經理、中央通訊社社長、  
自立晚報社長、澳洲自立快報社長

### 代表著作：

「堅持：一個媒體人的真摯省思」、「媒體與改造：重建台灣的關鍵工程」、  
「新聞革命進行式：全球崛起的公民媒體」(合著)、「新聞業的危機與重建：  
全球經驗與台灣省思」(合著)、「公眾委製新聞的時代來臨：weReport 調查報  
導平台的意義與展望」(合著)、「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合著)

## 授課大綱：

- 一、解嚴之後的媒體生態變化
- 二、當前媒體生態的特質與問題
  - (一)商業媒體利潤掛帥本質
  - (二)媒體產業與政治的結合
  - (三)媒體集團與壟斷的形成
- 三、媒體結構的理想圖像與現實落差
- 四、台灣的商業、公共與第三類媒體地景
- 五、打造民主傳播生態系統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 參考書目：

- 吳浩銘、林采昀(2014)。《媒體生病了：臺灣新聞環境的症狀與因應》。台北，巨流。
- 胡元輝(編)，(2016)。《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 胡元輝(編)(2010)。《新聞革命進行式—全球崛起的公民媒體》。台北：先驅媒體。
- 洪貞玲(編)(2015)。《我是公民也是媒體：太陽花實踐的新媒體》，台北：大塊文化。
- 管中祥(編)(2015)。《光影游擊最前線：華人獨立媒體觀察》。台北：紅桌文化。
- 陳順孝(編)(2015)。《新聞創業相對論》。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 講義 1：

### 新聞與民主

#### ——過去、現在與未來

胡元輝

*Th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s that opportunity be given that idea to spread and to become the possession of the multitude. ... The essential need i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thods and conditions of debate, discussion, and persuasion. That is the problem of the public.*

— John Dewey

毫無疑問，好新聞是好民主的基石。許多民主理論家與新聞研究者從不同角度，為上述斷言提供了論證。實務上亦然，當新聞培力了資訊通達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或實踐了看門狗新聞學(watchdog journalism)，我們經常為之喝采。

儘管西方民主國家經過長時間發展所建構出來的新聞專業(professional journalism)理念與體制，缺陷甚多，甚至被質疑為商業資本主義的奴婢，只是虛構的幻象。但在某個意義上，此類批判仍可視為「好新聞是好民主基石」的另類註腳，因為遭到質疑的是新聞的品質，而非好新聞的價值。

無論從什麼角度推演新聞與民主的理論關係，幾乎沒有人否認，此一關係的現實實踐已遭逢極大挑戰。近 20 年來，新聞破產之說不絕於耳，最主要的象徵就是財團模式新聞業(corporate journalism)，或是媒體大集團(media conglomerates)營運系統的破損，有人甚至將之稱為崩解。形成此一營運模式大破損的原因甚多，但新聞企業主卻多視新傳播科技為其元凶，彷彿只要新科技不來，舊模式即可安然無恙，天下太平。

英國學者 James Curran 將各界有關當前新聞困境的觀點，分為轉型(transition)、危機(crisis)、瀉藥(purgative)與復興(renaissance)等四類，其中主要為新聞業領導層所抱持的轉型論，就是認為新聞科技所帶來的衝擊已在業者有效控制之中，因此新聞業並無危機可言，而是正經歷一場良善治理(well-

managed) 的轉型。相對的，無論是新聞業正在弱化公眾理解 (public understanding)、威脅民主的危機論；或是將新聞業當前困境視為吃了瀉藥，藉此清理有毒新聞體制的激進觀點；抑或認為危機就是轉機，各種新興媒體及營運實驗將使新聞業開創新局的復興論，都不認為既有新聞業能夠或應該以現有面貌走向未來。

無論如何，新聞與民主的實踐境遇，向來受到民主社會的高度關注，視好新聞為民主機制重要基石者，更是殫精竭慮，亟思透過新聞品質的提升，帶動民主品質的升級。本世紀初以來，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傳播型態推陳出新，新聞與民主的處境再生變化，彼此關係亦再現新局。究竟新科技、新媒體對民主政治正面作用大，抑或負面影響多？允為此一變遷中最受關注、亦最受議論的課題。

在尋求解答此一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行檢視新聞與民主的發展脈絡。

## 代議制度的缺弊

從某個意義來看，不斷演變中的民主與新聞，目前都遭逢「專業代議機制」失靈的嚴重困擾。

熟悉西方民主體制發展史者皆知，由人民選出各種公職人員來反映民意或治理政務的代議民主制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乃是現代民主制度的主幹。人們相信這些以政治為專業的代議士，可以代表大家更有效能的運作政治機器，也具有足夠的公信力來凝聚眾人意志。但是，代議民主制的理想型態非但未在現實中得到完美的實踐，甚至還出現許多嚴重悖離民主精神的現象。人們的失望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政治代議士的作為失去了人民的信賴，大家不認為在許多缺陷下被自己「集體」選出的代議士，符合自我的期待。

民主政治的關心者因而試圖在代議民主的架構下，透過其它機制提昇民主的品質。從大方向而言，這些作法包括 19 世紀中期逐漸成型的創制、複決等直接民主制 (direct democracy)，以及上世紀 80 年代逐漸興起的審議民主制 (deliberative democracy)。前者企圖將若干決策交回人民直接公決，以補代議士專擅的缺失；後者則希望透過公民慎思明辨的參與，決定自己的未來。兩種制



度都有其複雜的發展歷程與制度設計，但毫無疑問，它們都是針對代議民主制缺弊所興起的改革，也可以說是對「政治專業」的重新定位與評價。

近二、三十年來，在民主品質的衰退現象受到政治領域關注的同時，新聞品質的衰退亦受到新聞領域的高度議論。從公共新聞(public journalism / civic journalism)的倡議到目前風起雲湧的公民新聞(civic journalism /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可以說都是此種媒體生態下的反思性改革行動。而且毫無疑問的，它們都是對「新聞代議士」表現的反彈。公共新聞的推動者強調，專業新聞(professional journalism)的信賴度之所以不斷下墜，關鍵在於專業新聞工作者並未讓公民生活真正成為新聞的主體，因而要求專業媒體必須傾聽公民的聲音，其作法包括採行類似審議民主所推動的公民會議及審議式民調等等，但方式更為簡單與多元。後者則是直接推動公民產製新聞，並將此種新聞分權與平權化的改革視為媒體民主化的重要進展。

美國學者 Janet Kolodzy 因此將傳統的專業新聞比喻為代議新聞(representative journalism)，專業記者如同公眾的眼與耳，替大家掌握世事的發展，同時化身為公眾的代表。網路公民新聞則使新聞從單純的代議制度轉變為類似市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的運作型態，公民不依靠傳統專業組織的新聞來瞭解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是自力產製新聞，參與公共事務，就好像市民大會中的社區公民，不再透過代議士進行公共事務的決策，而由自己直接參與市政的討論一樣。Kolodzy 認為，代議新聞就如同代議民主，雖是一種理想的典範，卻無法實現自己的崇高承諾，因為現實中的新聞業乃是一種生意(business)，業者做生意的考量常常遮蔽了公共服務的思維。

Kolodzy 的比喻生動刻劃出政治與媒體領域對「專業代議機制」俱皆存在的不滿。無論是代議民主或代議新聞，都因自身表現的缺陷導致公眾信任的下降，新科技的出現則成為提升民主與新聞品質的重要契機。例如在新科技的協助下，網路投票等形式的直接民主已經變得相當容易與便利，同樣的，具有直接民主精神的公民新聞亦不再有產製技術上的困難，公民創辦媒體的門檻大幅下降。若是如此，新聞生態的改善豈非形勢一片大好？



## 傳播科技的迷思

許多人對傳播科技的突破抱著高度樂觀的情懷，網際網路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趨於普及之後，許多人即將之視為民主與新聞的大利多，甚至認為一個公民當家、民主至上的新時代就將到來。如今，不僅美麗的烏托邦尚未來臨，網路世界與實體世界的相似性亦愈益鮮明。

過去，我們總批評傳統的主流媒體以利潤為導向，經濟主義(economism)掛帥，資訊品質有嚴重商品化導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商品化的背後乃是一個所有權益趨集中，政商聯結益為緊密的媒體利益集團。此種媒體集中化的趨勢引來言論集中化的高度疑慮，事實上，許多研究均顯示，各媒體的資訊禁區日漸擴大，除了關係企業的資訊報導受到限制外，各種政商關係的維護亦成為難以逾越的雷池。

如今，許多人開始憂心以網路為基礎的新興媒體，原本清新的面貌不僅蒙塵，而且可能受到愈來愈多的限制與污染。資訊品質的正確性、娛樂化與淺薄化，固然是不曾間斷的質疑，有些原本支持公民新聞與新媒體功能的人士，亦對網路使用者公共資訊的獲取能力感到疑慮。更值得注意的是，網際網路的開放性似乎也禁不起政治經濟學的檢驗，我們一方面看到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的呼籲，另一方面亦發現網路世界同樣出現實體世界的媒介壟斷現象。

很顯然，以往傳播科技的發展經驗並未提供我們足夠的警訊與教訓。知名的哈佛大學法學教授 Lawrence Lessig 即指出，當印刷媒體、電報與收音機等傳播創新面世時，許多人都以為可以藉之增進一般大眾在產製與消費媒體上的能力，例如收音機開始發展的最早階段，原本想像這項科技新可以成為一種屬於個人的溝通工具，類似火腿族(ham radio)兼具播送與接收內容的功能，但實際演變的結果是它被操控在商業力量之下，並由政府指配頻率，顯然最初的想像並未實現。收音機、電視如此，網路何嘗不然？Lessig 因此強調，新媒體科技由於所處政經結構的影響，它的民主潛能根本無法實現。

著名的美國媒改運動大將 Robert W. McChesney，同樣強力論證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謬誤。他指出，傳播科技乃特定政策下的結果，並非科技的本質決定媒體的發展，而是政策與商業力量決定科技的走向。例如



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的廣播發展，政府就透過技術標準的訂定對廣播施以影響，而此一政策制定的過程又常常被自利的商業團體所主導。類比廣播如此，數位廣電的情形亦復如是，美國廣電業者協會(NAB)在 1996 年電信法的立法過程中，便成功的為現有廣電業者爭取到二倍以上的頻寬，並阻止了重新打造電視體系的討論。因此，我們要對網際網路的發展抱以高度警覺，避免它再度被自利的商業團體所控制。

在自由市場的經濟理念下，這些新媒體已逐漸成為政商利益結構的一環，愛爾蘭學者 Michael J. Breen 便認為，舊媒體集團仍可能主控新媒體的發展，然而它們只在意利潤，將使商業利益成為網際網路發展的真正控制因素，其結果邊緣聲音與公共辯論被壓制，商業內容被揚升，媒體內容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要將成為重要的道德問題。

凡此俱皆顯示，科技雖然是推演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但科技的特質並不能決定自己的未來，科技應用的模式相當程度決定於政經力量的考量。反言之，也唯有掌握科技使用的決策，媒體的新聞服務才能真正符合進步民主的需要。所以在探討新聞與民主的未來時，或許首先要問的是：我們希望擁有什麼樣的媒體結構？必須即刻思索的是：我們要制訂什麼樣的媒體政策？

### 媒體結構的理想圖像

已經有若干研究者為我們勾勒出從現實基礎出發的理想圖像。

例如英國學者 James Curran 以西歐經驗為基礎，提出一個以公共服務廣電系統為核心，周圍環繞私營(private)、社會性市場(social market)、專業性(professional)與公民(civic)媒體的運作模式，此一模式的主要特徵在於創建一個不受市場與政府控制的媒體系統，乃是由資本主義長出，卻又對其侷限予以民主回應的「第三條路」(third way)。美國的媒改運動大將 Robert W. McChesney 同樣力倡崇奉商業主義的美國，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非營利與非商業媒體部門，藉以扭轉高度商業化(hyper-commercialized)的文化體系。此種公共媒體體系包括線上與非線上的媒體，如社區與低功率調頻廣播與電視台，公共頻道的使用，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s)，以及強化的公共廣電部門等。



上述學者與媒改運動者所處的環境雖有差異，解決問題的思維亦不全然相同，但他們顯然都聚焦於公共及非營利媒體對市場邏輯的補正功能。將此思考連結到上述有關新媒體與科技關係的思考，一個有助於新聞與民主正向關係的理想媒體藍圖顯已呼之欲出。

首先從「新聞產製」的角度出發，我們在「專業媒體」（亦即傳統上由專職工作者從事新聞產製的媒體）之外，顯然應該培植具有直接民主精神的「公民媒體」（由一般大眾產製新聞內容的媒體），以及涵蘊審議民主精神的「協作式媒體」（專業的媒體工作者與一般公民彼此協力產製新聞內容的媒體）。協作新聞(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 pro-am journalism)目前已經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全球醞釀與嘗試之中，並有許多學者及推動者將之視為解決專業及公民新聞品質問題的重要途徑。

另外，從「新聞組織」的角度來講，亦有三種類型的媒體，必須在整個媒體生態中取得平衡的角色。此即商業媒體（透過廣告或其他商業模式，以營利為目的的媒體）、公共媒體（在公眾同意下，以政府預算或人民付費等公共方式營運的媒體）與非營利媒體（由一些社會團體或個人所支持運作的非營利性媒體）。國人對商業及公共媒體可能不陌生，對非營利媒體則多半侷限在宗教團體所支持的媒體，其實在一些民主國家，由社會運動或倡議團體所發展出的另類媒體，業已成為資訊傳播的重要成員，此外由公益基金會與慈善家所支持的新興非營利媒體，近年來更已展現頗為亮眼的成果。它們多數以網路為基礎平台，在商業媒體營利模式逐漸破損的情況下，已有愈來愈多的人認為，這種非營利媒體的角色將越來越為吃重。

### 當務之急的媒體政策

為了邁向上述兼具理想與現實的媒體結構，使新時代的新聞能對民主產生更為正面的作用，政府顯然有必要制訂一個積極而具體的傳播政策。我們當然反對政府干預媒體應有的自主空間，但尊重傳播自由並不等於政府的放任無為。事實上，從有媒體以來，政府也不曾在傳播事務上缺席，唯有符合公共利益的傳播政策介入，媒體生態才有可能得到實質的改善，新傳播科技的出現也才能真正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



已有許多研究者對此念茲在茲，即以前引的學者為例，James Curran 賦予高度關注的公共改革主義(public reformism)，其中便包括不同形式的國家介入(state intervention)。McChesney 更是針對國家的媒體政策一再提出建言，甚至認為應該推動更寬廣的社會改革運動。他的媒體政策建議除了涉及網路中立性及媒體教育等事項外，更包括透過反托拉斯與傳播法律來促進媒體所有權的多元化，運用郵資補助來鼓勵各類型的出版品，以及被視為最具價值的建立非營利與非商業的廣電體系，特別是公共與社區廣電媒體與公眾近用的電視頻道。

理想的媒體圖像並不會憑空而至，從媒體政策入手來支持非營利或公共媒體的發展，推動公民與協作媒體的實踐，非但不是新聞自由的干預，更已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網路並沒有對民主的病症提供一種快速的科技治療，．．．(但)此一持續發展中、不昂貴也易於使用的工具，結合它所產生的社會關係的網絡特質，業已開啟民主史的新章。」這是瑞典學者 Peter Dahlgren 對網路新科技所做的研究結論。誠然，明日的科技仍將讓人驚豔，但科技能否成為新聞與民主的利器，仍決定在其所處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更決定於我們要以什麼樣的媒體政策來對待新科技的使用。

新聞的昨日已是昔日黃花，我們或許不能完全掌握明日新聞業，但至少不能坐視今日新聞業的墜落。

## 講義 2：

### 另類公共領域的美好戰役——318 占領國會運動中的獨立與公民媒體

文／胡元輝

毫無疑問，台灣已經是網絡化社會；同樣無可置疑的是，網絡化公眾 (networked publics) 已改變新聞的產製與傳佈方式，甚至開闢出另類的公共領域。此次 318 占領國會運動為上述斷言做出了最新的註腳。

諸多數位時代資訊流動的研究者均指出，網路、社交媒體與行動通訊等新傳播科技的蓬勃發展，業已打破傳統由專業人士所掌控的權威性資訊產製結構，大眾不僅自己搜尋新聞，抑且分享、討論與產製新聞。此種資訊平權化的現象以大眾協作為其特徵，並已開闢出嶄新的網絡化公共領域 (networked public spheres)，公眾藉由社群網絡連結在一起，並對公共議題進行資訊分享與意見溝通。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由於資訊流動的即時性與同步化，此種以中介的社會性 (mediated sociability) 為特質所建構的網絡化公共領域，往往在傳統媒體尚無法為新聞事件建構框架之前，即已透過公眾之間的對話先行做出詮釋，並反過來影響傳統媒體的框架化過程。當然，網絡化公眾可能仍是多元公眾，並形成多元的公共領域，但傳統媒體的資訊霸權已因此種新形態的文化通貨 (cultural currency) 而受到更大程度的挑戰。

318 占領國會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網路串連的產物，事件發生之後，學生與民眾更透過各種數位工具進行號召與宣傳，包括社交媒體 Facebook、Twitter、電子告示版 PTT 與手機簡訊軟體 LINE，都是資訊傳遞的重要管道。此外，各種直播的影音平台亦將立法院議場內、外的狀態同步傳送於國人面前，讓有意瞭解事件發展狀態者都可以免除中介，直接且不經任何詮釋地掌握「現場」。此種全面性、即時性的資訊分享，不僅創造了新的資訊流，更開闢出另類的公共領域。



318 事件發生之後，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傳統媒體儘管仍想為此一事件「定性」，但不只此種框架化的行動必須受到新生資訊流的影響，而且傳統媒體亦已喪失「一言定江山」的詮釋霸權。許多新聞工作者都已身處於網絡化的資訊流動之中而難以抽身，同樣的，他們的所有產品亦都必須受到此一新興公共領域的檢驗。尤其意義的是，許多公民與獨立媒體已成為此一多元公共領域的重要發言者，公眾一方面分享他們的獨立訊息與觀點，另一方面亦同時以之比對與針砭傳統媒體。

在此次事件中，受到關注的獨立媒體至少包括《沃草》、《零時政府》、《關鍵評論》、《新頭殼》、《苦勞網》、《風傳媒》、《台灣民報》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等，更有在事件現場大量報導最新動態而受到注目的學生媒體——《台大新聞 e 論壇》。據瞭解，這些媒體的流量都大幅增加 10 倍以上，後者的粉絲數更由數千人一舉達到 12 萬人。除了常態化產製新聞的獨立媒體之外，許多獨立媒體人及專家、公民所撰寫的評論或見解，亦大量被轉載與分享，即使是長篇文章亦不減其威力，許多網友樂意閱讀並提出評論。

至於公民新聞方面，從許多個人部落格、臉書到《YouTube》、《PeoPo》、《We 公民新聞》等平台，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公民書寫，不僅為歷史留下寶貴紀錄，亦成為現實世界新聞產製流程中的重要素材。饒富意義的是，公民新聞在此次 318 占領國會運動中，除了再次發揮「見證」功能，讓公民所拍攝的現場影片成為還原事件真相的有力證言以外，亦展現了「搭橋」效用，讓許多私領域的事務得以進入公領域，例如許多參與運動的學生與家人之間的對話被「公開化」，雖然是私領域的討論，卻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豐富了我們對生活世界的同理心的理解。

我們雖然無法判定網絡化公共領域到底在 318 占領國會事件上發生了多大的對話功能，亦無法否定傳統媒體仍然存在的傳播效力，但一個有別於傳統大眾媒體的新資訊生態系統確已更為穩固的形成，獨立媒體與公民新聞則在此一系統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儘管此一系統未必能育成理性批判的公共領域(此點需要警覺並賦予更大的努力)，但作為對抗與衡平主流媒體與官方思維的另類公共領域而言，顯然已「打了美好一仗」。

新聞學者 Adrienne Russell 曾以生動的語言譬喻新時代的新聞生態：「精靈已躍出瓶外，公眾則離沙發而去」。318 占領國會事件明白告訴我們，霸權意識形態壟斷資訊的時代已一去而不復返了！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深入看媒體 2014/4/11)

### 講義 3：

#### 開發群眾資助的民主潛能—318 占領國會運動的另一啟示

文／胡元輝

對台灣民主發展留下深遠影響的 318 占領國會運動雖暫告段落，但不僅整個運動將持續深耕，此一過程中所湧現的諸多新現象，更值得沉澱與反思，方足以轉化為台灣民主土壤的肥沃養分。從傳播的角度來看，業已受到公民運動採用的群眾資助(crowdfunding)，即為其中一個可以深刻探討的議題。

此次因立法院審查兩岸服貿協議所引爆的占領國會運動，最被津津樂道者之一，就是 3 月 24 日於群眾募資平台《FlyingV》所進行的廣告集資行動。該募資提案上線不過三小時就達成 633 萬元的募款目標，並在為時一天的募款中得到 3,621 人合計 693 萬餘元的贊助，其速度之快、金額之多，均刷新台灣群眾資助的紀錄。最後，募款者亦順利於台灣蘋果日報及美國紐約時報(如圖 1)刊登廣告，宣傳占領國會運動的訴求與真相，後者所引發的國際關注實不可小覷。

占領國會運動的廣告募資案不只讓台灣的群眾資助平台受到更多矚目，亦讓此類平台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得到更多注意。其實，群眾募資與前衛、另類及反抗性活動素有淵源，被列舉為第一個透過網路集資以完成美國巡迴演唱的英國搖滾樂團 Marillion，就是一個被主流排斥的異議性樂團，他們不僅對英國政府有強烈批判，而且表演與曲風都擁有獨特的自我風格。2008 年網路募資平台興起之後，更有許多社會運動與異議人士借助此類平台獲取金援。

占領國會運動以群眾募資方式刊登廣告的作法，國際上早有先例。去(2013)年 5 月 28 日，土耳其政府欲將首都伊斯坦堡一座城市公園改建為購物中心，引發環保人士在公園搭帳篷抗議，其後更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引發該國近十年





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行動。政府的鎮壓行動非但無法平息眾怒，反而造成警民間的激烈衝突，整個過程最終導致 6 人喪生，上千人受傷。

但民間的反對行動起初並未受到主流媒體重視，抗議人士只好靠網路與社群媒體傳播訊息。6 月 2 日，一些住在紐約支持抗議行動的土耳其人，即於美國群眾募資平台《Indiegogo》提案，希望募集 53,800 美元，藉以在報端刊登廣告爭取國際關注與支持。該案於 6 月 9 日結束募款時共募得 108,371 元，約為原募款目標的兩倍。提案人最後同樣於紐約時報刊登廣告(如圖 2)，對政府的鎮壓行動與威權統治表達強烈抗議。

在土耳其抗議廣告之前，尚有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電視廣告案。該項群眾募資提案是於 2011 年 11 月透過群眾募資平台《Loudsauce》所提出，總共集資約 6 千美元，製作出一支 30 秒廣告片於電視播出。頗為特殊的是，於 2009 年創立的《Loudsauce》平台，不為其它事募款，專為有意製播廣告以推動社會變革的提案進行集資。它強調自己的使命就是「將廣告媒介由以驅動消費為主轉化為以公民參與為主」，具體而鮮明地彰顯了群眾資助的社會運動潛能。

群眾募資對社會運動所能做出的貢獻當然不只是廣告而已，包括抗議行動本身以及對行動進行報導所需的經費都曾運用此類平台募款。前者如 2012 年西班牙金融危機爆發時，一群匿名的西班牙公民以創立募資平台的方式，尋求與宣告破產的惡質銀行集團 Bankia 進行訴訟所需的經費，最後募得 18,359 歐元。後者更是廣泛存在於各類型募資平台，例如蘇丹南部努巴地區的公民報導團隊—「努巴之眼與耳」(Eyes and Ears Nuba)，同樣於 2012 年運用美國另一個知名募資平台《Kickstarter》募得 45,000 美元，建立一個多媒體的網站來向全世界揭發該國總統 Al-Bashir 殘害努巴人民的實況。

我國此次占領國會運動不只激發出《VDemocracy》這個台灣第一個專為社會運動服務的募資平台，亦突顯了以深度報導、調查報導為目標的新聞類集資平台的意義。正是因為主流媒體的逸樂化、感官化取向，使得它們平常就不關注社會運動，甚至在運動受到關注後猶扭曲或醜化社會運動，方使獨立媒體與公民新聞益顯其重要性，但沒有財團或組織支持的獨立媒體人與公民記者要如何運作？若干國家的經驗顯示，群眾資助已成為他們經費來源的可能途徑。台灣目前已經存在非營利性的新聞資助平台《weReport》，且其運作較世界許多



國家同類型平台更為穩健，可以說是台灣民間社會擁有旺盛生命力的另一印證。

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觀念的鼓吹者 Jeff Howe 曾言，群眾外包是運用人們過剩的能力，而群眾資助則是運用人們多餘的金錢。從群眾資助近些年的全球發展態勢與此次台灣占領國會運動的經驗來看，群眾資助就算用得是大眾的「閒錢」，顯然亦可發揮聚沙成塔的公民參與功能。就群眾募資有助於凝聚人民心向、展現多元價值的角度言之，台灣的公民們，我們顯然擁有主權在民的諸多武器，端看我們用不用、如何用而已！



左圖為 318 占領國會運動於紐約時報所刊登之廣告  
右圖為土耳其反政府人士於紐約時報所刊登之廣告

(媒體觀察報第 11 期 2014/04/21)